

近代日本帝國大學「新史學」的 發展與臺灣史研究

藍弘岳*

本論文以全球史視野，從近代日本歷史學的形成與歐洲學術互動的過程，來理解臺灣史研究的「新史學」展開過程。首先，本文認為從近代日本帝國史學形成的脈絡來理解臺灣史研究史的話，則臺灣史研究的「新史學」當始於曾受教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並成為日本近代歷史學啟蒙者的里斯(Ludwig Riess)所寫的《臺灣島史》。所以，本文以里斯、坪井九馬三和伯倫漢(Ernst Bernheim)的方法論為主，從近代日本對西方史學的引進論起，再探究帝國大學的歷史方法論研究的發展。然後，以里斯《臺灣島史》為主，討論其臺灣史研究內容，及在里斯的啟發下，辻善之助、村上直次郎等明治以後成長的第一世代日本歷史研究者如何展開海外交通史、日歐交流史的研究，從而也將其研究視野擴及臺灣乃至南洋(東南亞)的過程。進而，討論此一研究脈絡如何透過幣原坦和村上直次郎的弟子岩生成一等人在臺北帝國大學展開與臺灣史相關的研究。最後，本文強調里斯的臺灣史研究雖被更精密的南洋史視野下的臺灣史研究取代，但背後的世界史視野並未消退。

關鍵詞：臺灣史、新史學、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里斯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臺灣史的書寫、研究始於何時？此一問題的答案端看我們從什麼觀點來理解臺灣的歷史。¹自清朝起，《臺灣府志》等傳統方志便十分豐富，²日本在江戶時期也有《臺灣割據志》、《臺灣鄭氏紀事》等受中國史學傳統影響的著作，此外也不乏旅行紀錄與人類學田野調查。³若從漢人主體的開發史觀或中華民國史觀來理解臺灣史研究，則可由上述清代方志及《聖武記》等史書論起，接續連橫(1878-1936)《臺灣通史》一類日治時期漢人的漢文歷史著作，及二戰後中華民國的臺灣史研究。⁴然而另一方面，日本學者(尤其是後來任職於臺北帝國大學的日本學者)也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展開了正式的臺灣史研究。要了解這些研究，就必須將它們放回近代日本帝國史學形成的脈絡。

1 關於臺灣史的史學史研究，張隆志已有詳細且精彩的研究，見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臺北，2009)，頁161-184。他指出：「1980年代臺灣史研究可溯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日本殖民地研究、戰後以來的中國邊疆及地方史研究，以及1960年代以來的西方區域研究等多重知識傳統」(〈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頁164)。從這一理解來說，本研究主要探求日本殖民地研究的臺灣史研究，及可謂其前提的帝國大學相關研究。

2 參閱吳密察，〈「歷史」的出現——臺灣史學史素描(一)〉，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1-21。洪健榮，《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20)。

3 關於清代文人的遊記等，參閱鄧津華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4 1949年後的臺灣史研究概況，可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另外，臺灣史學本身的發展概況，參閱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13：3(臺北，2002)，頁21-42。

當然，作為外來殖民者，日本人的臺灣史研究也不免以外來統治者為主體、立基於外來政權中心史觀。⁵但不同於清朝對臺灣的歷史書寫，明治以後，日本知識界受近代西方史學影響，開始以科學的角度書寫日本史、世界史乃至臺灣史。事實上，若將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以降重視歷史知識客觀性和史料批判、考證的史學方法(即科學史學)稱為「新史學」，⁶並從近代日本帝國史學形成的脈絡理解臺灣

5 吳密察，〈臺灣史の成立とその課題〉，收入溝口雄三主編，《周縁からの歴史 アジアから考える[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頁 229。又，關於臺灣史觀的問題，也參閱若林正文，〈「臺灣島史」論から「諸帝國の斷片」論へ——市民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臺灣史觀一瞥〉，《思想》，1119(東京，2017)，頁 85-96。

6 村川堅固在他翻譯蘭克著作《世界史論進講錄——附·近世列強史論·政治學說史論》之〈序〉中已主張蘭克是「新史學的鼻祖」，參見蘭克著，村川堅固譯，《世界史論進講錄——附·近世列強史論·政治學說史論》(東京：平凡社，1932)，頁 6。又，說到「新史學」，相信許多人會想到梁啟超所提倡的「新史學」。然梁氏所謂的「新史學」主要指以進化論、文明進步等思想為背景形成的。其形成雖有中國本身的脈絡，但基本上是受本文所說之「文明史學」(啓蒙史學)媒介影響，參見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3)，頁 191-236。梁啟超對於新史學的論述參照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另一方面，1920 年代後，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之史學方法論也吸收了蘭克以降的科學史學，參見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臺北，2003)，頁 184-185。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史料學派」之出現也是在此一脈絡下，故也是本文所說的「新史學」。王汎森也指出，傅斯年藏書中無蘭克之著作，但讀過班漢姆(本文譯為「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著作，其著作混合實證主義和蘭克學派的要旨。並且王汎森也討論了傅斯年與蘭克的異同，認為傅斯年不若蘭克重視外交史和形而上學等，參見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77-78。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近代日本史學對近代西方史學方法的理解也相當依賴伯倫漢的著作，故其著作對東亞史學的意義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黃進興曾有文章論述，參見黃進興，〈中國近

史研究，則臺灣史研究的「新史學」當始於師承蘭克的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所寫的《臺灣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⁷

相對於東亞世界以朝代、地域為中心的正史、方志等書寫傳統，來自西方的「新史學」以國家、民族為單位來研究、書寫，或進一步由國家間的往來探討國際政治和世界歷史。臺灣在過去的歷史研究中雖不被視為獨立的國家，但是里斯由世界史視角出發，藉由「新史學」探究臺灣島上的歷代統治民族變遷。同時，在里斯的啟發下，辻善之助(1877-1955)、村上直次郎(1868-1966)等明治以後成長的第一代日本歷史研究者，及再下一個世代的岩生成一(1900-1988)等人，開始從事海外交通史、日歐交流史研究，從而將研究視野擴及南洋(東南亞)與臺灣。其後更在南進政策需要下，產生了日本帝國史視野下的南洋史學，以及與臺灣史相關的研究發展。

所以，二戰前日本帝國史視野下的臺灣史研究和之後中國史視野下的臺灣史研究、中國史研究，都必須從蘭克史學所代表的「新史學」論起。早有學者指出 1949 年後來到臺灣的「史料學派」和日治時期

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香港，1997)，頁 266-268。另外，胡昌智與李孝遷也針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參見胡昌智、李孝遷，〈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中華文史論叢》，131(上海，2018)，頁 279-340。但就整個大的歷史脈絡說，蘭克史學乃至蘭克所學習的文獻學(philology)是「傅斯年創建史語所時，history 和 philology 並列的背景」，語見張谷銘，〈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臺北，2016)，頁 382。⁷ 方豪也認為日本接受近代西洋史學研究法(「新史學」)始於本文討論的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創設，即以里斯和坪井九馬三共同主持該學科講席為起點，他雖未言及《臺灣島史》，但主張在那之前「有關於臺灣史的書籍，也只能稱之為史料」，見方豪，〈日人著作中臺灣漢文文獻紕謬述例〉，收入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 1078。

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皆淵源於歐陸的科學史派。⁸本文將延續此一論點，從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的發展脈絡切入，針對臺灣史研究問題深化相關論述。

基於上述觀點，本文將從全球史視野，即近代日本歷史學的形成與歐洲學術互動的過程，來理解臺灣史研究「新史學」的展開。筆者將從近代日本對西方史學的引進論起，再探究帝國大學歷史方法論研究的發展，及其與臺灣史研究之關係，最後再爬梳臺北帝國大學在南洋史學脈絡下的臺灣史研究。

二、明治前期的史學：帝國大學史學科成立之前

(一) 明治日本對歐美學術的接受：外籍教師、留學生

德川政權於寬永十年(1633)實施鎖國政策，禁止在外的日本人回國，也禁止日本人離開日本。但經歷幕末一連串對外危機，特別是美國黑船來航後，日本開始僱用外國人，也逐漸派人到海外學習。幕末時期已約聘兩百名外國人來擔任科學技術、醫學和語學方面的顧問、教師，⁹而明治新政府也大抵繼承幕末政策，大量僱用外籍教師以吸收

8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收入關玲玲、楊宗霖編校，《李東華教授論文集》(新北：稻香出版社，2013)，頁 240。原論文出處是見於《中國論壇》，241(臺北，1985)，頁 36-43。李東華後來又在深入探究相關問題，參見李東華，〈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1928-1960)〉，收入李金強編，《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147-171。該文後再收入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9 アーダス・バークス(Ardath W.Burks)，〈西洋から日本へ——お雇い外國人——〉，收入アーダス・バークス編，梅溪昇譯，《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留學生・お雇い外國人と明治》(京都：思文閣，1990)，頁 182。

歐美新知識。除了史學領域的里斯外，如法學領域的博瓦索納德(Émile Gustave Boissonade, 1825-1910)、語言學領域的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等都是著名的例子。研究指出，約有兩千多名歐美人士在明治前期赴日擔任顧問與教師等工作，傳授西洋新知。¹⁰其中，擔任教師者有八百人左右，¹¹他們對於日本的近代化與新制度制定有不可抹滅的貢獻。然而，這些大學外籍教師的薪資對財政造成極大的負擔，以明治六年(1873)來說，外籍教師薪水就佔了文部省總預算 14% 左右。¹²對於明治政府而言，這些外籍教師僅是吸收西方知識的昂貴特效藥，儘快培養日本人到歐美留學，取而代之，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派遣官費留學生到歐美。¹³特別是明治八年(1875)，政府全面改訂留學制度，制定〈文部省貸費留學生規則〉，以精英主義為方針，希望以留學歸國的日本人逐漸取代外籍教師，成為「東京開成學校」(東京帝國大學的前身之一)教學主力。進入東京開成學校的學生本就是從各地選拔出來的精英，而派遣到外國的留學生又是

10 アーダス・バークス(Ardath W. Burks)，〈西洋から日本へ——お雇い外國人——〉，頁 189；〈グリフィスのテーゼと明治のお雇い外國人政策〉，收入アーダス・バークス編，梅溪昇譯，〈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頁 218-221。

11 尾形裕康，〈西洋教育移入の方途〉(東京：野間教育研究所，1961)，頁 75-100、139。又依梅溪昇據《日本帝國統計年鑑》統治的資料指出，明治前期(1872-1898)包括官方和私人受聘的外國人達一萬八千多人。其中，官方聘請有 6,193 人，私人聘請有 12,540 人。梅溪昇，〈お雇い外國人の研究〉(東京：青史出版社，2010 年)，頁 37-38。

12 ロバート・S・シュワンテス(Robert S. Schwantes)，〈日本の發展におけるお雇い外國人〉，收入アーダス・バークス編，梅溪昇譯，〈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頁 209。

13 アーダス・バークス(Ardath W. Burks)，〈日本から外へ——海外留學生——〉，收入アーダス・バークス編，梅溪昇譯，〈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頁 134。

從中挑選出來的精英中的精英，許多人在留學歸國後都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如穗積陳重[1855-1926]等)，幫助促進日本學術之獨立與西學的日本化。¹⁴

明治十五年(1882)，在〈官費海外留學生規則〉制定後，政府將「貸費」(貸款)改為「官給」(官方給予的獎學金)，因此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關畢業生和教師可利用公費留學。這大抵是因為文部省希望東京大學的優秀人才為政府服務，故以公費支持其留學。但到明治二十年(1880)後，隨著日本國內教育制度漸上軌道，利用公費到歐美留學的人轉以學院研究者、教育者為主。同時，德國也成為最主要派遣留學前往的國家，進而導致教育與學術體制的德國化。¹⁵

(二) 啓蒙史學的流行

承上所述，歐美留學人數的增加與留學的體制化促成了近代日本學術體制。但單就歷史領域而言，在帝國大學史學科成立之前，歐洲史學早就透過書籍翻譯、外交工作者、留學生和外籍教師等管道進入日本。如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的《英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1857)、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1787-1874)的《歐洲文明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28)等皆被翻為日文，因此受西方文明史論影響之啓蒙史學(文明史學)在明治前期已相當流行。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啓蒙史學相信人類理性的普世性與進步的理念，秉持以科學態度解釋文明發展過程之實證主義精神，意圖探究歷史中的因果關

14 石附實，《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學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72)，頁192-232。

15 石附實，《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學史》，頁236-248。

係，與近代歐洲自由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¹⁶

啓蒙史學在十九世紀後期基本上已退出歐洲史學主流，但在日本卻有許多人紛紛開始以啓蒙史學觀點論述日本史，最有名的是福澤諭吉(1835-1901)的《文明論の概略》。不同於過去的日本史論，福澤在該書中既不特地詮釋皇室系譜，也批判過去以政府為主的歷史敘述。反之，他結合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政治經濟學，展開以日本民族全體之文明進步為基軸的歷史敘述。¹⁷其他相關史學著作還有如田口卯吉(1855-1905)試圖結合歷史學與經濟學寫下的《日本開化小史》(1877)，及三宅米吉(1860-1929)結合歷史學與社會學寫出的《日本史學提要》(1886)等。¹⁸另外，由於啓蒙思潮引導，這些著作在明治初期的教育中也頗受歡迎。帝國大學前身東京開成學校時期的史學教育就是使用巴克爾的《英國開化史》(即《英國文明史》)作為教科書。¹⁹

(三) 考證史學的發展

上述啓蒙史學主要是在近代西方知識基礎上由在野知識人主導發展而成，他們雖具備科學的方法論意識，但不重視史料考證；相對地，明治初期出現一批站在官方立場且重視史料考證的史學者。明治

16 小澤榮一，《近代日本史學史の研究・明治編——十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學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頁 1-15。

17 小澤榮一，《近代日本史學史の研究・明治編》，頁 126-190。

18 關於日本的啓蒙史學，參閱小澤榮一，《近代日本史學史の研究・明治編》，及酒井三郎，《日本西洋史學發達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頁 51-66。

19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 7 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頁 66。又，《英國開化史》是大島貞益於明治八年翻譯的版本，《英國文明史》則是土居光華等人於明治十二年所翻譯的，參閱酒井三郎，《日本西洋史學發達史》，頁 53。

政府於明治二年(1869)起展開復興古代國家的國史編纂工程，在昌平學校內設置國史編輯局。明治五年(1872)，該局移往太政官歷史課，並在明治八年(1875)改設置為修史局(1877年再改為修史館)。²⁰修史局編纂人員本擬繼承古代「六國史」編纂傳統，但後來改以江戶時代開始編纂的《大日本史》為正史，繼承《大日本史》編纂工程，欲將之改編為《大日本編年史》。²¹也就是說，修史局乃基於王政復古理念，重視中國正史傳統之構想，打算在水戶藩的《大日本史》基礎上編纂《大日本編年史》。所以，他們以《大日本史》為基礎資料，檢討文獻真偽，促進考證史學的發展。

考證史學以修史局人員為主，有重野安繹(1827-1910)、久米邦武(1839-1931)、川田剛(1830-1896)等人。他們繼承傳統正史編纂的思維，受漢學(特別是清朝考證學)方法影響，一方面追求客觀事實、重視史料考證，另一方面也拒絕勸善懲惡的儒學史觀，反對將道德、文學混入歷史書寫中，讓史學得以從經學、文學中獨立。²²這樣的思維後來也促使他們放棄編纂正史，讓歷史回歸純學問的世界。因此，明治十八年(1885)內閣制度成立後，修史館降為內閣臨時修史局，明治二十一年(1888)再移到帝國大學。

重視正史的東亞史學傳統被轉化為西方大學系統中史料編纂、收藏的機構，修史館員也成為帝國大學教師。他們的工作從編纂正史轉為研究日本史，批判道德名教主義，重視史料蒐集、考證、批判等史學方法。但修史館員也非鐵板一塊，其內部也有不少差異。相較於重野安繹重視考證，久米邦武除考證外也重視因果推理，欲以科學態度研究歷史。²³正是由於重視歷史實證，久米邦武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發表了〈神

20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冊，頁69-70。

21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冊，頁71-74。

22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冊，頁74-82。

23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冊，頁82-88。

道乃祭天之古俗(神道は祭天の古俗)》，欲以實證方法解釋古代日本史，從而觸犯到天皇制國家禁忌，於明治二十五年(1892)被帝國大學辭退，更導致史誌編纂掛遭到廢止。其後，重視實證的歷史學也必須以不違反國家利益為前提進行。明治二十八年(1895)，政府將原「史誌編纂掛」改名為「史料編纂掛」(1929年再改為「史料編纂所」)重新出發。然因該年甲午戰爭勝利強化了日本去中國化的傾向，致使受日本國學傳統訓練的年輕教授三上參次(1865-1936)成為史料編纂掛的指導者，漢文系統的正史書寫也日益不受重視，轉而著重於史料蒐集及編纂、出版。²⁴

這一轉換過程促使修史館員更注意歐洲的近代史學，因此末松謙澄(1855-1920)便在明治十二年(1879)託策爾非(George Gustav Zerffi, 1820-1892)撰述關於西方史學沿革與方法的著作。策爾非後來寫出 *The Science of History*，由中村正直翻譯第一章、嵯峨正作(1853-1890)翻譯其他章節，命名為《史學》。²⁵該書稱歷史為科學，保有十九世紀歐洲史家對歷史客觀性的樂觀主義性質，然其內容重視歐洲古代史學，幾乎沒有關於近代歐洲歷史研究方法論的內容，不符合修史館員期待，影響恐怕不大。²⁶其後，里斯來到日本，更清楚地教導明治歷史學者關於近代西方史學重視實證的研究方法。日本史學因此從傳統的考證史學與強調普世主義和進步的啓蒙史學(文明史學)，進入了強調民族國家歷史之「新史學」時代。

24 宮地正人，〈史料編纂所の歴史とその課題〉，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歷史學と史料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頁163-171。

25 酒井三郎，〈日本西洋史學發達史〉，頁64。

26 マーガレット・メール(Margaret Mehl)，千葉真、松澤裕作等譯，《歴史と國家——19世紀日本の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學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7)，頁88-101。

三、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發展與歐洲學術

(一) 帝國大學文學部的沿革

明治十年(1877)，江戶時代的昌平坂學問所、開成所、醫學所等三個單位正式合併成東京大學。隨之成立的文學部包括第一科史學、哲學、政治學、第二科和漢文學科，但因缺乏適當教師，明治十二年(1879)史學遭到廢除，並另外加入理財學(經濟學)。明治十四年(1881)，哲學獨立為第一科，政治學和經濟學為第二科(1885年再改為法政學部)，和漢文學科為第三科。明治十五年(1882)成立古典講習科，但僅收兩屆學生後即廢止。從上述變化可知，明治前期的文學部教育不僅重視對西方學術的吸收，也強調對於日本傳統學問的保存。²⁷

明治十九年(1886)，東京大學改名為帝國大學，文學部改稱文科大学，除原本三科(哲學科、和文學科、漢文學科)外，又加入博言學科(1900年改為言語學科)，後復於明治二十年(1887)增設史學科、英文學科、德國文學科。因里斯至東大執教，原本廢止的史學科重新設置，但以西洋史為主。至明治二十二年(1889)，又新設國史科，並將和文學科改為國文學科，漢文學科改為漢學科，隔年又新設法國文學科。明治三十年(1897)，隨京都帝國大學成立，帝國大學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明治三十七年(1904)，上述九個學科(哲學、國文學科、漢學科、博言學科、史學科、國史科、英文學科、德國文學科、法國文學科)再度統合為文學、哲學、史學三學科。大正八年(1919)，文科大学又改回文學部，文學、哲學、史學三學科制度廢止，原本附屬其

²⁷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頁411-417。

下的十九個學科各自獨立，至昭和七年(1932)修減為十七個學科。²⁸

(二) 史學科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從史學科的發展談起。明治十九年(1886)，由畢業於政治理財科的坪井九馬三(1859-1936)與外籍講師狄克生(James Main Dixon, 1856-1933)開始教授史學。然而由於狄克生的專業實為英國文學，故當史學科於明治二十年(1887)成立時，便從德國招聘里斯教授西洋史學，並命坪井留學歐洲。²⁹明治二十一年(1888)，因修史局事業移交文科大學新成立之「臨時編年史編纂掛」，重野安繹、久米邦武、星野恒(1839-1917)等人遂轉任文科大學教授，史學科亦隨之增添日本史課程，並於隔年另外成立國史科。明治、大正時期，國史科主要由受到里斯教導的三上參次、黑板勝美(1874-1946)、辻善之助等人主導，故有重視科學實證的學風。³⁰

至於東洋史學方面，雖早在明治十九年(1886)便有「支那歷史」課程，但直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支那史學科」才從漢學科中獨立出來。明治四十三年(1910)，支那史學科改稱東洋史學科，由市村瓚次郎(1864-1947)教授中國史、白鳥庫吉(1865-1942)教授蒙古和西域史。而原本專攻西洋史學的白鳥庫吉也師承里斯，重視科學實證的近代史學方法。³¹

最後再回到西洋史學。明治二十四年(1891)，坪井留學歸國，與里斯一起教授西洋史學。明治三十五年(1902)，里斯辭職歸國，由歐美留學歸國的箕作元八(1862-1919)繼任。其後，受坪井與里斯教導的齋藤清

28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頁 418-424。

29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頁 643-644。

30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頁 607-618。

31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頁 624-629、644。

太郎(1872-1941)、村川堅固(1875-1946)、原勝郎(1871-1924)、坂口昂(1872-1928)等人相繼成為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引領明治、大正時期的西洋史學，但遲至大正八年(1919)西洋史學科才正式成立。同一年，箕作元八去世，其後齋藤清太郎、大類伸(1884-1975)、今井登志喜(1886-1950)等人陸續擔任教授，主導西洋史學科。³²

在帝國大學史學發展過程中，不論是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的發展都與里斯有關。因為他除了直接教授西洋史學外，也教歷史研究方法論。正是他所教導的近代西方史學方法深深影響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史學。

(三) 帝國大學的歷史研究方法論：從蘭克到里斯、坪井九馬三、伯倫漢

里斯是德國籍猶太裔的歷史學家，他在柏林大學主修歷史，師從戴布流克(Hans Gottlieb Leopold Delbrück, 1848-1929)。其赴日本任教的原因可能是當時駐德公使品川彌二郎(1843-1900)向柏林大學提出要求後，由戴布流克推薦；也可能是由 1885 年起就在「獨逸學教會學校」教書的戴布流克胞弟恩斯特·戴布流克(Ernst Delbrück)等人引介。³³里斯曾受教於有「近代歷史學之父」美稱的德國史家蘭克，因此他也是將蘭克史學帶入日本的重要中介者。但實際上，里斯是蘭克的「寫字生」(協助

³²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頁 643-660。

³³ マーガレット・メール(Margaret Mehl)，《歴史と國家——19世紀日本の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學問》，頁 123。但現今關於里斯之生平與在日本的情況，最完整的研究當是金井圓，〈歴史學——ルードウィヒ・リースをめぐる〉，收入金井圓，《お雇い外國人 17——人文科學》(東京：鹿島出版會，1976)，頁 128-197。

整理史料、原稿)，可能只見過蘭克兩次。³⁴我們不清楚里斯向蘭克學到了什麼，但他確實相當欽慕蘭克。

1. 蘭克

蘭克被認為是近代史學(即本文所說「新史學」)的開創者。他一方面跳出過去意圖以普遍理性了解世界的啓蒙史學，另一方面也不同意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歷史哲學。黑格爾將神學、歷史、哲學轉化為形而上的歷史哲學，將歷史理解為理性、自由意識的展現過程，故其世界史是朝向精神自由前進，也是世界精神展現的過程。在黑格爾看來，國家的創建代表自由意識之覺醒，具有不同民族精神的國家代表世界史發展的不同階段，而全體人民皆享有自由的日耳曼民族的世界即為世界歷史發展的終極(老人時期)。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給予我們歷史能動性的觀點，並從形而上觀點出發，透過辯證法來陳述。³⁵

活躍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的蘭克批判黑格爾的歷史觀和歷史敘述，主張歷史不能以抽象哲學來敘述，世界史不是世界精神和其理念的展現。蘭克將歷史從哲學、文學中獨立出來，結合歷史理論與實際著史行動。他的指導理念是：各個時代皆有支配該時代的傾向，而史家的任務就是敘述該傾向，並以各時代自身的標準評價那個時代。如蘭克在其世界史論代表作《世界史論進講錄》(*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³⁶中，表明「在上帝之前，人類所有的時代皆是平等的，史家

³⁴ 金井圓，〈歷史學〉，頁 137。

³⁵ 關於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論著眾多，本文主要參照的是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頁 50-56。

³⁶ 該書是蘭克為巴伐利亞王國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of Bavaria, 1811-1864)演講之內容，蘭克簡潔地導出世界史觀的全貌。在日本，除村川堅固翻譯的《世界史論進講錄——附·近世列強史論·政治學說史論》版本外，尚有鈴木成高《世界史の概観》和村岡哲《世界史の流れ》等二

也必以如是態度來觀察事物」。³⁷蘭克主張的世界史也不是集各種國家史為一體的萬國史，而是以諸民族、國家的發展、互動、關聯來開展。³⁸因此，蘭克重視普遍史的實踐，認為普遍史的課題是探索那些結合及統治所有民族的偉大事件。儘管其普遍史範圍實際上是以基督教的歐洲文明為主，然因普遍史重視偉大的歷史事件，故其歷史敘事著重於政治與外交。³⁹在《列強論》中，蘭克由國際政治史角度來敘述世界史，從路易十四時法國在歐洲的霸權論起，討論英國、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諸國如何發揮國家力量和國民精神，脫離法國制約，進而形成列強勢力均衡的國際狀況。⁴⁰所以，就其歷史語境來說，蘭克的國際政治思想也是從大國政治的觀點承認維也納體制，並由五大強國(英、俄、奧、普、法)以外交協調方式來維持國際秩序。⁴¹

就其歷史研究方法論而言，蘭克本從事神學與文獻學研究，但他將神學與文獻學方法運用於歷史學中，奠定歷史研究的基礎。⁴²他重視史料的內部批判與外部批判，故強調語言學等學科對治史的重要性，將歷

種譯本。又，本文對於蘭克的理解，主要參照林健太郎，〈ランケの人と學問〉，收入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林健太郎編，《世界の名著——ランケ》(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頁 1-41

37 蘭克，〈第一回進講〉，收入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村川堅固譯，《世界史論進講錄》，頁 7。

38 佐藤真一，《ヨーロッパ史學史——探究の軌跡》(東京：知泉書館，2016)，頁 236-237。

39 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頁 60-64；林健太郎，〈ランケの人と學問〉，頁 20-23。上述《世界史論進講錄》(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的世界史內容其實也只是歐洲史。

40 蘭克，《列強論》，收入林健太郎編，《世界の名著——ランケ》，頁 45-83。

41 大原俊一郎，〈ドイツ國際政治學の歴史的な文脈と思想——反霸權から秩序形成へ〉，《亞細亞法學》，59：2(東京，2016)，頁 165-167。

42 佐藤真一，《ヨーロッパ史學史——探究の軌跡》，頁 222-225。

史從傳說、神話乃至宗教中獨立出來，以重視科學實證的方法來敘述歷史，並由世界史視野理解民族、國家的歷史。⁴³不過，蘭克本人並沒有關於歷史研究方法論的專著，僅在課堂和著作中零星論及，而這些方法論隨後主導了十九世紀中後期以降歐洲近代史學的發展。⁴⁴

2. 里斯

里斯歷史知識的重要來源固然是蘭克的著作，但也不僅於此。他在柏林大學曾聽過朵伊森(Johann Gustav Bernhard Droysen, 1808-1884)的歷史方法論，受過完整的中世史訓練，並以中世英格蘭的議會史為研究題目，展現出對世界史的關心，從世界史視野探究英國議會制度。⁴⁵里斯延續其於柏林大學所受的訓練，在帝國大學教授《歷史方法論》(*Methodology of History*)、《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英國憲政史》(*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世界史要說》(*A Short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等課程。⁴⁶依據現存的《歷史學方法論》講義錄，課程涉及朵伊森的歷史方法論和伯倫漢的歷史方法論相關書籍。⁴⁷雖朵伊森與蘭克的關係不甚友好，政治態度也不同，

43 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頁 56-60。

44 Hans Schleier, "Ranke in the Manuals on Historical Methods of Droysen, Lorenz, and Bernheim," in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edited by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1.

45 西川洋一，〈東京と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歷史學と史料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頁 203-205。

46 這些講義錄大都現存在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的リーバアマン(Liebermann)文庫。因為該圖書館於 1937 年向里斯的友人 Felix Liebermann(1851-1925)購入 3000 部左右的書籍，其中包括里斯的講義錄。金井圓，〈歷史學〉，頁 148。

47 依據其講義錄《歷史學方法論》(*Methodology of History*，東京大學總合圖

前者批判蘭克只重視史料考證，並較蘭克對歷史敘述的主觀性問題更為敏感，但兩者對歷史方法論的重視是相同的。⁴⁸

里斯的《歷史方法論》(*Methodology of History*)導論第一節就強調史學的科學特色(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history)。⁴⁹他解釋歷史方法論的基礎方法(elementary methodology)包括：I形成問題(molding the question)、II探尋史料以得到啟發推知史實(heuristics)、III史料的批判、考證(critique)、IV解釋(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⁵⁰在這些德國既有的歷史方法論引導下，里斯在日本教授學生近代西方歷史研究方法，重視歷史的科學性質，強調史料批判、考證與其他有助歷史研究的輔助科學。⁵¹

此外，里斯的歷史學論被認為具新蘭克學派特色，重視科學的歷史學，以國家為歷史發展的重要單位，並以列強的角逐和均衡為主要歷史

書館藏本)，里斯列出 W. Wachsmuth, *Entwurf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e* (Halle, 1820); J.G.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Leipzig, 1882); E.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Leipzig, 1889); E. A. Freeman,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1886); O. Lorenz,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Hauptrichtungen und Aufgaben: kritisch erörtert* (Berlin, 1886)等歷史方法論的參考書(頁 19)。相關研究在日文中有金井圓〈歷史學〉等，英文有 John S. Brownlee,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1945: The Age of the Gods and Emperor Jimmu* (Vancouver: UBC Press, 1997)介紹里斯的史學方法論(頁 77-80)，但對其理論來源沒有進一步的討論。相對之，胡昌智與李孝遷在〈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中指出，里斯史學方法英文講義根據的是朵伊森 1882 年的《歷史知識理論大綱》(*Grundriss der Historik*)(頁 321-325)。

48 陳致宏，《德家史家朵伊森(J.G.Droysen)的歷史思想與現實意識——以《希臘化時代史》為研究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2)，頁 161、162。胡昌智，〈譯介朵伊森書評〈提升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臺大歷史學報》，51(臺北，2013)，頁 187、188。

49 Ludwig Riess, *Methodology of History*, 2.

50 Ludwig Riess, *Methodology of History*, 20-66.

51 西川洋一，〈東京と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頁 206。

動因。⁵²我們可說新蘭克學派將蘭克史學中關於列強抗衡的觀念擴展到殖民地的競爭舞臺上，就此意義而言，「新史學」也為帝國主義提供理論基礎。⁵³里斯雖與新蘭克學派一樣關心國際政治，但由於在日教書的經驗而特別關心日本史及日本在世界史上的意義。⁵⁴他也是在日本的擴張中注意到臺灣，從而以「新史學」角度展開對臺灣的研究。

因此，我們必須在以蘭克為首的德國史學發展脈絡中理解里斯，而他也的確將蘭克的歷史方法論導入日本。據里斯的學生村川堅固所言，里斯最愛讀蘭克的書，也常在課堂上援引。⁵⁵1898年，里斯應村川堅固之邀，寫下介紹蘭克的短文——〈空前的大史家〉，⁵⁶後附錄於《世界史論進講錄——附·近世列強史論·政治學說史論》(由村川堅固翻譯蘭克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而成)。里斯在文中指出，史學家既要發現並運用新史料，也要進行史料批判，做出得宜的解釋，讓得出的結果活生生地貼近現實。因此，他推崇蘭克的《近世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1874)為歷史研究法模範。其次，他

52 西川洋一，〈東京と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頁 208、209。關於新蘭克學派，參閱 Wolfgang J. Mommsen, "Ranke and the Neo-Rankean School in Imperial Germany: State-oriented Historiography as a Stabilizing Force," in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124-140.

53 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彭剛、顧杭譯，《德國的歷史觀》(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頁 172。

54 西川洋一，〈東京と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頁 214-217。里斯著有 *Allerlei aus Japan* (Berlin: Deutsche Bücherei, 1905)。日文譯本為里斯著，原潔、永岡敦譯，《ドイツ歴史學者の天皇國家觀》(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8)。

55 里斯，〈空前的大史家〉，收入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村川堅固譯，《世界史論進講錄》，頁 1。

56 里斯，〈空前的大史家〉，頁 1-4。

讚賞蘭克的研究領域廣泛，除世界史外，對歐洲諸國歷史都有著作，且在政治史外對文化也有不少著述。最後，他認為蘭克著作文采斐然，是德國散文中的傑作。其後，里斯編修韋伯(Georg Weber, 1808-1888)《普遍的世界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1882-1889)十六卷，⁵⁷將之重新出版，並寫下序論“*Die Aufgabe der Weltgeschichte*”。1922年，其弟子坂口昂與安藤俊雄將這篇〈序論〉譯為日文，出版成書，名為《世界史の使命》，並將里斯稱為蘭克學風之祖述者。⁵⁸里斯在該文中討論歷史考察的原理、史學與其他精神科學的關係、世界史對象、世界史運動的原動力、文化發展的階段、世界史家之任務、歷史研究的史料與輔助學科(言語學、金石文學、古文書學、古泉學、印章學、地理學、年代學、系譜學)等，這些都是蘭克史學所重視的問題。

3. 坪井九馬三

不應忘記的是，另一位帝國大學史學科教授坪井九馬三才是第一位將德國史學方法論整理成日文書的日本學者。坪井著有《史學研究法(東京專門學校文學教育科講義錄)》、《史學研究法・改訂增補版》、《稿本最近世界史》、《論理學講義》、《最近政治外交史》、《歷史地理學》等書，大抵皆由上課講義整理而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史學研究法》，坪井在該書中主張史學當以科學研究方法進行，且從社會「生存競爭」角度來理解歷史。⁵⁹他強調時代區分的重要性，也大致與里斯一樣以言語學、古文書學、地理學、年代學、考古學、系譜

⁵⁷ Georg Weber,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3. Aufl., Vollständig vollständig neu bearbeitet von Ludwig Riess. Leipzig. 1919 (Bd.I.), 1920 (Bd.II.).

⁵⁸ 里斯著，坂口昂、安藤俊雄譯，《世界史の使命》(東京：岩波書店，1922)，頁1。

⁵⁹ 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東京：京文社，1930)，頁1-8。

學、古泉學(貨幣)為歷史的輔助學科，並以考證(又分「外部的批判[鑑定遺蹟、古器物、古文書等史料的真偽]」、「內部的批判[論證史料能在何種程度上解釋歷史事實]」)和解釋(演繹、綜合解釋等)為歷史研究的方法。⁶⁰

4. 蘭克、里斯、坪井與伯倫漢

值得注意的是，坪井九馬三的《歷史研究法》雖大抵受伯倫漢(Ernst Bernheim, 1850-1942)歷史研究方法論影響，其中許多史料操作實例卻直接採自日本史。故該書可謂明治史學理論高峰，影響當時的日本史研究。⁶¹此外，里斯雖也著有歷史研究方法論《歷史知識理論——一個歷史思考與研究的工具》(*Historik: Ein Organon geschichtlichen Denkens und Forschens*, 1912)，但他在《世界史の使命》中也特別推薦伯倫漢的《歷史研究教本》(中文又譯《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1889)，及其節略版《史學綱要》(中文又譯《歷史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05)。⁶²這個節略版在日本也被翻譯成書，名為《歷史とは何ぞや》。可見伯倫漢的方法論對近代日本史學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不過，坪井和里斯之所以推薦並利用伯倫漢的方法論著作，主要也是因為其內容大致宗於蘭克提倡的科學的歷史學方法論，依然保有科學樂觀主義，且書中有許多對中、近世史料批判的解釋實例，堪稱當時最完整的方法論著作。⁶³事實上，作為歷史方法論專家的伯倫漢可說是蘭克第二代弟子，

⁶⁰ 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頁 295-496。

⁶¹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 7 冊，頁 101-102。坪井雖宗伯倫漢史學，但他與伯倫漢不同，重視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胡昌智、李孝遷，〈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頁 326、327。

⁶² 里斯，〈備考〉，收在《世界史の使命》，頁 5-6。

⁶³ Hans Schleier, "Ranke in the Manuals on Historical Methods of Droysen, Lorenz, and Bernheim," 119-123.

他提供追求史料真實性的方法，且與蘭克一樣相信真實而具體存在的歷史客體。⁶⁴翻閱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⁶⁵即可知他常參閱蘭克的作品，推崇《近世史家批判》等「具有近代科學意義之歷史」，欣賞蘭克認為史家當「實事求是」的觀點。⁶⁶

因此，除了里斯在課堂上教授以蘭克為主的近代歷史學方法外，這些相關書籍也被逐漸翻譯成日文，並開始出現如坪井九馬三這樣整理出版德國近代史學方法論的日本學者。這些方法論著作引導近代日本史學的展開，如里斯的學生黑板勝美就在坪井九馬三《歷史研究法》的影響下寫出《國史的研究》，將日本的國史學抬升到近代史學水平。⁶⁷

四、帝國大學的臺灣史研究

(一) 里斯的臺灣史研究：以《臺灣島史》為主

里斯在日本教導歷史方法論與西洋史學，其方法論對於日本史研究本身的發展確有影響，但也不應過度誇大。⁶⁸另一方面，我們也應

⁶⁴ 胡昌智、李孝遷，〈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頁 286、310-317。

⁶⁵ 筆者所參考的是伯倫漢，陳韜譯，《漢譯世界名著——史學方法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然姚從吾指出此譯本「譯文讀起來也不甚明白」，可能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姚從吾，《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一卷——歷史方法論》（臺北：正中書局，1981），頁 14。胡昌智、李孝遷則指出若就譯文相似程度來判斷，陳韜譯本與 1928 年開始分 46 期連載《史苑》的小林秀雄之日文譯本《史學研究法》可能有一定的淵源。胡昌智、李孝遷，〈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頁 327、337。

⁶⁶ 伯倫漢，《漢譯世界名著——史學方法論》，頁 181。

⁶⁷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 7 冊，頁 107。

⁶⁸ マーガレット・メール，〈明治史學におけるドイツの影響——どれ程意

注意到他在教書之餘從事日歐交流史研究，寫下《臺灣島史》，並鼓勵學生重視日歐交流史，使得臺灣史研究在明治日本得以展開。筆者之所以在上一節花了許多篇幅解釋與里斯相關的「新史學」方法論在帝國大學的發展，主要就是希望說明其方法論不僅和日本史研究相關，也影響了日本的世界史研究及臺灣史研究。因為里斯重視科學的歷史學，強調世界史中列強角逐與均衡的重要性，從而將殖民地的競爭納入研究視野。

里斯在日本教書和指導學生之餘，也從事研究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里斯的近代歷史研究方法重視史料，而他認為日本圖書館缺乏歐洲史相關史料，因此不鼓勵學生研究歐洲史。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日本與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荷蘭等歐洲國家的交流史就算在西方也少有人研究，於是建議帝國大學去海牙的古文書館抄寫日蘭交流相關史料，並鼓勵學生重視東西交流史。⁶⁹他自己也以身作則，在《史學雜誌》中發表〈荷蘭海牙市中關於日本歷史的古文書(和蘭ヘーグ市に於ける日本歴史に關する古文書)〉、〈納荷德(Oskar Nachod)的日蘭交流史(オスカル・ナコット氏の日蘭交通史)〉、〈平戶英國商館的歷史(平戸に於ける英國商館の歴史)〉等關於日本與歐洲國家交流史的文章。⁷⁰

如前所述，里斯的歷史研究本就具世界史視野，並重視國際政治，從上述著作也可知里斯相當熱中於東西交流史研究，而《臺灣島史》正是此一脈絡下的產物。該書源於里斯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於東京演

義ある影響だったのか〉，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歷史學と史料研究》，頁 182-201。

69 土肥恒之，《西洋史學の先驅者たち》(東京：中公叢書，2012)，頁 13。

70 土肥恒之，《西洋史學の先驅者たち》，頁 13-14。而且，里斯歸國後也將其在日本的見聞寫成一本書在德國出版，後來該書也被譯為日文，書名為《ドイツ歴史學者の天皇國家觀》(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8)。

講的講稿，增補修訂後以德文形式刊在《德國東亞自然與人文學會會刊》(*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第六卷第五十九號(1897年4月)。明治三十一年(1898)，吉國藤吉將之譯為日文，並以《臺灣島史》之名出版於富山房出版社。⁷¹此書日文版內容如下：第一章「臺灣最古老的住民和琉球之名稱(臺灣最古の住民并琉球の名稱)」、第二章「馬來人占領臺灣的時代及始末(馬來人臺灣占領の時代及顛末)」、第三章「客家渡來人之始末(客家渡來人の顛末)」、第四章「歐洲人臺灣島見聞之始末(歐人臺灣島見聞の顛末)」、第五章「日本人渡臺的起源及殖民政策之失敗(日本人渡臺の起源及殖民策の失敗)」、第六章「荷蘭人及西班牙殖民臺灣之創立(和蘭人及西班牙人臺灣殖民の創立)」、第七章「濱田彌兵衛和臺灣總督彼得·奴易茲間的爭鬥(濱田彌兵衛と臺灣總督ピーター・ヌイツとの爭闘)」、第八章「荷蘭統治下的臺灣(和蘭治下の臺灣)」、第九章「國姓爺的臺灣征略(國姓爺の臺灣征略)」、第十章「臺灣獨立的時代(臺灣獨立の時代)」、第十一章「支那統治時代的臺灣(支那統治時代の臺灣)」、第十二章「結論」，共計十二章。

該書被認為是「學院史家臺灣島史書寫的里程碑」，⁷²不僅是第一本以德文撰寫的臺灣史論著，也應是第一本譯為日文的德國臺灣論著。該書依據蘭克史學重視史料蒐集與考證的方法，大量引用如《早期荷蘭傳道史料》(*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1887)、《耶穌會書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1781)、法倫泰因(François Valentijn, 1666-1727)《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1724-1726)等歐

71 該書的中譯本先由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德文系畢業的周學普(1900-1983)翻譯而成，刊在《臺灣研究叢刊第三十四種——臺灣經濟史三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後來，姚紹基再從新編譯之，書名為《福爾摩沙島史》。

72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頁161-184。

文史料，也在日本人幫助下引用《元史》、何喬遠(1558-1632)《閩書》等中國史書，及菅沼貞風(1865-1889)《大日本商業史》等日本著作，此外還有荷蘭文、法文、西班牙文與德文的臺灣相關論著，如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的《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1893)、⁷³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的《地理問題研究——中國史家眼中的異族(十九)——琉球國》(*Problèmes Géographiques: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storiens Chinois. XIX. Lieou-Kieou-Kouo*, 1895)、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的《被遺誤的福爾摩沙》(*'t Verwaerloosde Formosa*, 1675)、霍克斯(Francis L. Hawks, 1798-1866)的《美軍遠征中國海域與日本記事》(*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1856)等等。⁷⁴

透過對這些史料與書籍的運用，里斯表現出蘭克史學重視政治外交史的特色，主要從建立殖民地、對臺灣統治權的爭奪與戰爭，及「濱田彌兵衛事件」、「牡丹社事件」等國際外交事件來鋪陳臺灣史。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將臺灣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島，從這個島的統治者如何由馬來人更替為荷蘭人(也論及其前已有客家人、日本人在臺灣活動)、中國人、日本人的角度來書寫，甚至還將鄭氏家族統治臺灣的時代，稱為「臺灣獨立的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里斯花了許多篇幅討論第十一章「中國統治下的福爾摩沙」，並將清朝對臺灣的統治比擬為法國在路易十四時期收復位於德法邊境的史特拉斯堡和亞爾薩斯地區，統治長達約 190 年的情

73 該書現有中譯版：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74 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對該書引用的相關歐文的注解詳細，本文所列舉的書名皆依據該書。

況。這似乎是以上述蘭克《列強論》之歐洲中心世界史為知識背景展開的論述。里斯從列強競逐和歐美國家對臺灣之殖民野心切入，討論清領臺灣時期的歷史。因此，里斯論述自美國培里將軍帶領的艦隊來臺並表明對臺灣的興趣後，法國、英國、德國乃至日本如何開始覬覦臺灣，並在臺灣進行貿易。更進一步將日本和清朝視為兩個「東亞帝國」(Ostasiatischen Kaiserreichen)，討論日本自臺灣出兵事件至正式殖民臺灣的歷史過程。⁷⁵另一方面，他也討論歐美國家重新對殖民臺灣產生興趣前的臺灣歷史，主要以「朱一貴事件」和「林爽文事件」為例，認為自 1683 年以來長達 174 年的臺灣歷史乃由一連串戰亂所構成，且清朝政權並沒有積極統治原住民。⁷⁶

總之，里斯延續列強勢力拓展的世界史觀點討論十九世紀的臺灣史，只是加入日本和中國兩個「東亞帝國」，並正面肯定日本殖民臺灣的意義。他於結論主張：日本統治後，「臺灣島」將與「這個世紀的進步文明世界」有直接聯結，迎來新的時代。⁷⁷可以看出，里斯除了從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理解臺灣外，也傾向從日本的角度來理解臺灣歷史。

該書最有意思的論點即與此一日本視角有關。里斯在第一、二章中主張，雖然一般認為臺灣最早的移住者是馬來人種，但以前中國人將今日琉球諸島與臺灣合稱為「琉球」，而臺灣西北部最早的住民即是從琉球諸島來的，其遺族則為今日臺灣南部的「琅璦」族(Lonkiu, ロンキュー，從「琉球」的日語發音轉音而來)。他的「琉球論」是針對施古德《地理問題研究——中國史家眼中的異族(十九)——琉球國》之「琉球論」的挑戰。簡而言之，施古德認為明代以前的中國史書作者以「琉球」專指臺灣，

75 里斯，《福爾摩沙島史》，頁 270-326。

76 里斯，《福爾摩沙島史》，頁 242-270。

77 里斯，《福爾摩沙島史》，頁 328。

後來才將之擴張到臺灣東北方的琉球諸島(即沖繩)，並開始與島上的琉球王國往來。而里斯則主張中國人早就將臺灣和其東北方的琉球諸島合稱為「琉球」(流求, Liukiu)，最早的臺灣移民即來自琉球諸島，並進一步假設中國是受到生活在臺灣西岸的「琅璫」族影響，才用「琉球」這個名稱來合稱「琅璫」族生活的臺灣與琉球諸島。他以俄國為例，指出「俄羅斯」(Russian)的國名即是源於其中的「羅斯族」(Rus)。⁷⁸並用語言學等近代學科論證，中國人早在 1500 年前就用「琉球」(Liukiu)的音來稱「琉球」這個名稱，進而在十七世紀時，被習慣於對東亞名稱(特別是在喉音之前)加個 n 的荷蘭人，聽成「琅璫」(Lonkiu)。⁷⁹

上述推論與假說或難全部成立，但我們依然可感受到里斯試圖以科學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語言學等輔助學科來研究臺灣史。同時，其論述也明顯從日本、日語的角度出發。有意思的是，他所批判的施古德在該書發表不久後，便於《國際民族誌》(*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Ethnographie* 10 [1897])刊登〈福爾摩沙原先是琉球人的居住地嗎？〉(“Ist Formosa ursprünglich von Bewohnern der Liukiu-Insel bevölkert?”)提出反駁。由於施古德是荷蘭的漢學家，懂漢文，故批判里斯對於中國漢文典籍理解有問題，並認為其「琉球論」有為日本宣傳的政治目的。⁸⁰其後，里斯再度提出反駁，此處不再詳述。值得注意的是，里斯的臺灣史論不再只是中國方志式史書，也非人類學考察，而是在歐洲人的視野之外納入日本觀點的近代史學研究。當然，這不是臺灣人撰述自身國族歷史的史學著作，但該書的確在「新史學」視野中把臺灣帶入世界史的研究。同時，不論其實際意圖為何，該書確實具有合理化日本帝國主義的詮釋可能。事實上，正是此書開啓了日後日本對臺灣史的近代學術研究。

78 里斯，《福爾摩沙島史》，頁 58 上，譯者注 38。

79 里斯，《福爾摩沙島史》，頁 34-62。

80 姚紹基，〈導讀〉，《福爾摩沙島史》，頁 11。

而後面將提到的村上直次郎，也應是在里斯的東西交流史論、近代歷史學方法論的刺激下，展開其東西交流史和臺灣史研究。

法國漢學研究者、外交官于雅樂約莫於同時期出版了《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該書秉持著外交軍事目的，參考大量西方研究及中國相關史書、方志。⁸¹里斯的《臺灣島史》也參照了于雅樂的著作，但相較而言更具有近代史學方法論的意識與訓練。他的方法論與研究刺激學生往國史學、東洋史學乃至南洋史學發展，在後來成為帝國大學教授的白鳥庫吉、黑板勝美、辻善之助、村上直次郎等人中，黑板勝美、辻善之助便成為國史學的主導者，白鳥庫吉則是東洋史學的開創者，而繼承其東西交流史研究並開創南洋史學的人，就是後來到臺北帝國大學任教的村上直次郎。

(二) 史學科的臺灣史相關研究：村上直次郎

里斯之外，史學科(西洋史學)畢業的村上直次郎也從日歐交流史角度推進了臺灣史研究。村上直次郎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畢業於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同年進入帝國大學大學院就讀，接受坪井九馬三和里斯的指導。隔年，受拓殖務省囑託，復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受臺灣總督府囑託從事臺灣史編輯工作。⁸²村上在學術生涯之初就開始臺灣史相關的研究工作，可能與他在大學受里斯啟發而有志於東西交涉

81 戴麗娟，〈導讀〉，收入于雅樂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頁 xi-xxiv。

82 東方學會編，〈村上直次郎博士略歷〉，收入財團法人東方學會編，《東方學回想》，第1冊(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157。又，關於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葉碧苓在〈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一文中，已有非常詳細的考察，敬請參閱，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17(臺北：2008)，頁1-35。

史研究有關。⁸³

村上精通多國語言，是當時日本日歐交流史、南洋史的權威。他在學術生涯的前期主要致力於日歐交流史研究，校注《異國日記抄》（原出版於1911，後有增訂版出版於1929），出版《日蘭三百年の親交》（1915）、《貿易史上の平戸》（1917）等書。更因其早年研究〈臺灣新港社文書〉（《史學雜誌》第八編第七號，1897）而成為「新港文書」的命名者。在他之後，小川尚義（1869-1947）、伊能嘉矩（1867-1925）才開始收集、研究這種以羅馬拼音書寫西拉雅語的契約文書。

事實上，村上早在明治年間出版的《西洋商業史》中便已論及臺灣，⁸⁴相似的內容也出現在《日蘭三百年の親交》等關於日荷交流史相關的書中。以《日蘭三百年の親交》來說，他在「臺灣事件」一小節梳理了荷蘭殖民臺灣的過程，以及如豐臣秀吉（1537-1598）計畫征伐臺灣等的日臺關係，並提及荷蘭和日本的衝突（如濱田彌兵衛事件）。而在「蘭人の臺灣經營」一小節中，他探討了荷蘭人對臺灣的經營及新港文書相關問題，並涉及「鄭成功之臺灣占領」。⁸⁵稍後出版的《貿易史上の平戸》對臺灣的討論大致與《日蘭三百年の親交》相同。⁸⁶1922年，臺灣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成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希望撰寫以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為主的「新臺灣史」，而村上便因上述研

83 東方學會編，〈先學を語る——村上直次郎博士〉，收入收入財團法人東方學會編，《東方學回想》，第1冊，頁136。

84 村上直次郎，《西洋商業史（明治大學三十八年度商學科第一學年講義錄）》（東京：明治大學出版部，1905），頁163-176。

85 村上直次郎，《日蘭三百年の親交》（東京：富山房，1915），頁29-33、55-59。

86 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の平戸》（東京：日本學術普及會，1917），頁66-77。

究背景被聘為史料編纂事務囑託，來回於日本與臺灣之間。⁸⁷

如上所述，村上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日歐交流史，從而涉及荷蘭統治時期的臺灣史。其臺灣相關研究包括荷蘭與西班牙在臺的政治與傳教史(特別是跟語言相關的內容)，及日本與臺灣的歷史關係。村上對「新港文書」的研究展現了「新史學」方法論對語言學等輔助學科重要性的強調，而在荷蘭對臺經營的研究中，也利用了荷蘭方面的史料，從而得以克紹其師，在世界史視野中展開不同於過去只依憑漢文和日文史料的臺灣史論述；這些根據荷蘭史料做出的研究也為其後的幣原坦(1870-1953)承繼。然而，1910年代村上關於臺灣史的論述仍不多，日本與臺灣相關歷史將在之後的辻善之助和岩生成一手中獲得更仔細的研究。總體而言，我們可以推知村上在豐富的日歐交流史知識基礎上，又經歷「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史料編纂事務囑託的工作，故在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前對早期臺灣歷史的知識應已非常豐富，所以能超越其師里斯，推動此後世界史、南洋史視野下的臺灣史研究。

(三) 國史科的臺灣史相關研究：辻善之助、內田銀藏

里斯的另一位門生辻善之助也從交流史角度展開與臺灣史相關的研究。辻善之助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國史科，是日本代表性的佛教史權威，也是致力於日本與周邊國家交流史的著名研究者，著有《海外交通史話》(1917)，後於1930年再出版《增訂海外交通史話》(1942年再出增訂第五版)。該書內容從古代的「漢委奴國王印」講至幕末開國，囊括日本與海外諸國交流的豐富歷史。其中，在「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一章中，他利用前田家所藏的「豐臣秀吉高山國に送る書」等史料，論

⁸⁷ 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頁7、8。

及秀吉促使臺灣入貢一事。此外還設有「江戸時代遠征臺灣及菲律賓的企圖(江戸時代に於ける臺灣及菲律賓遠征の企圖)」和「濱田彌兵衛」、「德川家光侵略支那の雄圖與國姓爺(德川家光の支那侵略の雄圖と國姓爺)」等專題，討論與臺灣有關的歷史人物與事件。在這些研究中，辻善之助除了引用里斯的《臺灣島史》⁸⁸外，也利用《大日本史料》中所藏有關有馬晴信的史料，和《長崎古今集覽》、《通航一覽》、「松浦家文書」等日文史料，及納荷德(Oskar Nachod, 1858-1933)的 *Die Beziehungen der Niederländischen Ostindischen Kompagnie zu Japan i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 (Leipzig: Robert Friesche Sep., 1897)等歐文書籍。其研究與後來岩生成一臺灣史研究主題高度相關，可謂岩生成一臺灣史研究的重要先導。辻善之助在後來的增訂版中也引用岩生成一的研究。⁸⁹

此外，同樣畢業於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科，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史家內田銀藏(1872-1919)也在〈關於三百年前日本與臺灣之經濟的關係(三百年前日本と臺灣との經濟的關係に就きて)〉一文中，據喜田貞吉(1871-1939)在近江觀音寺發現的史料，討論三百年前日本人來臺灣與「大明人」、「南蠻人」進行貿易的歷史。⁹⁰總體而言，日本史學者是在日本史與日歐交流史的視野下對臺灣史產生關心的。

(四) 東洋史科學者的臺灣史相關研究

除了國史科學者外，東洋史學者也關注臺灣史相關問題。市村瓚次

88 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内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頁552、541。

89 辻善之助在《增訂海外交通史話》(頁443-444)中，引用岩生成一，〈豊臣秀吉の臺灣征伐計畫について〉，《史學雜誌》，38：8(東京，1927)。

90 內田銀藏，《國史總論及日本近世史》(東京：同文館，1921)，頁415-426。初出於《史林》，2：2(京都，1917)，頁240-248。

郎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畢業於帝國大學古典講習科，同年與林泰輔(1854-1922)、小中村義象(1861-1923)、關根正直(1860-1932)創立東洋學會，發行《東洋學會雜誌》。明治三十一年(1898)，他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稍後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升任教授，擔任支那哲學、支那史學、支那文學第二講座教授，並在昭和五年(1930)來臺灣任教兩年。⁹¹他著有《東洋史統》等重要著作，在紫禁城內閣東大庫發現明末清初鄭氏相關史料，據之撰寫〈清初臺灣の鄭氏に關する文書〉。⁹²此外，他在《支那史研究》中，設有「唐以前の福建及び臺灣に就いて」一章，認為臺灣因福建較晚開發而較晚被中國人認識，並主張《三國志》中孫權所征討的「夷洲」和《隋書》所載隋煬帝經略的「流求」即為臺灣。⁹³

其後，主導帝國大學東洋史學二世代的學者和田清(1890-1963)也撰寫了〈琉球臺灣の名稱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十四卷第四號，1924)、〈再び隋書の流求國に就いて〉(《歷史地理》第五十七卷第三號，1931)等論文，主張《隋書》中所說的「流求國」即指臺灣。琉球史家秋山謙蔵(1903-1978)則在〈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歷史地理》第五十四卷第二號，1929)、〈流求即臺灣說成立の過程——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關する第二論〉(《歷史地理》第五十八卷第六號，1931)、〈流求即臺灣說再批判——

⁹¹ 東方學會編，〈市村瓚次郎博士略歷〉，頁 22-23。

⁹² 市村瓚次郎，〈清初臺灣の鄭氏に關する文書〉，《史學雜誌》，13：9、13：10、13：11(東京：1902)。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學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收入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97-126)皆有相關問題的討論。又，相關史料的抄本現收錄在《鄭氏關係文書》(收入《臺灣文獻叢》，第 6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21。

⁹³ 市村瓚次郎，《支那史研究》(東京：春秋社松柏館，1943)，頁 329-338。原初出於《東洋學報》，8：1(東京，1917)。

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關する第三論》(《歷史地理》第五十九卷第一號, 1932)等文中批駁和田清的主張, 展開相關論戰。而白鳥庫吉也撰述〈隋書の流求國の言語に就いて〉(《民族學研究》第一卷第四號, 1935), 從語言學角度支持和田清的主張。凡此種種, 皆為東洋史學者在東洋史(主要是中國史)視野下, 利用漢文史料探討臺灣史相關問題的例子。

其實, 關於《隋書·流求傳》的解釋, 早在琉球正史《中山世鑑》(1650)和新井白石《南島志》等書中便已涉及, 且直到當代都持續有相關研究。⁹⁴這個問題不僅關乎中國, 同時也關乎日本、琉球和臺灣的歷史, 惟礙於篇幅, 關於不同論點的論據與背後意識形態當待來日另行撰稿說明。總之, 東洋史學在日本殖民時期主要是在上述論戰脈絡下涉足臺灣史研究。

經過上面的討論可知, 在明治、大正時期, 帝國大學的歷史研究者已從世界史、日歐交流史、日本史、東洋史等角度探討與臺灣史相關的問題。嚴格說來, 臺灣在這些研究中並非核心研究主題, 而是在其他研究視野壟罩下觸及的對象。然而無庸置疑的是, 這些都是利用第一手史料進行的「新史學」研究, 成為此後臺北帝國大學乃至二戰後臺灣史研究者的重要先行研究。

五、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發展與臺灣史研究

如前所述, 里斯在世界史視野中探究臺灣史, 並鼓勵學生重視日歐交流史。同時, 隨著日本帝國在南向擴張中將臺灣納入版圖, 又於一戰後受國聯委任統治南洋群島, 對南洋歷史的理解日益迫切。而南

94 山里純一, 〈『隋書』流求傳について——研究史・學說の整理を中心に〉, 《琉球大學法文學部紀要——史學・地理學篇》, 36(西原, 1993), 頁 59-98。

洋協會這一半官半民的經濟、文化組織遂在內田嘉吉(1866-1933)、田健治郎等臺灣總督府官僚的參與下，於大正四年(1915)創立，引領大正時期的南洋熱潮。⁹⁵其後，在繼內田嘉吉擔任臺灣總督的伊澤多喜男(1869-1949)和首任臺北帝國大學校幣原坦的努力下，臺北帝國大學成立，臺灣遂成為南洋學研究的主要基地。

早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阪谷芳郎(1863-1941)便提議在臺灣設置大學，但沒有實現。大正十一年(1922)，時任總督的田健治郎發布第二次〈臺灣教育令〉，以之為根據設置高等教育機關，並在昭和三年(1928)正式設置臺北帝國大學。⁹⁶臺北帝國大學分為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文政學有：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政學科等四個學科。僅就史學科而言，其先設東洋史講座(1928)、土俗學・人種學講座(1928)，後設南洋史學講座(1929)、國史學講座(1929)和西洋史學・地理歷史學講座。⁹⁷雖無以臺灣或臺灣史為名的講座，但在「臺灣帝國大學」(原名後改為「臺北帝國大學」)的〈說明書〉中已闡明，其創設宗旨是以臺灣為「南方文明之研究中心」，

95 河西晃祐，〈南洋協會と大正期「南進」の展開〉，《紀尾井史學》，18(東京，1998)，頁40-45。

96 李恒全，〈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史に關する一考察〉，《神戸大學發達科學部研究紀要》，14：1(神戸，2006)，頁47。另外，關於臺北帝國大學制度及其發展與上課內容等方面的研究頗多。其他尚有吳密察，〈殖民地大學とその戰後〉，《記憶する臺灣——帝國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臺灣史研究》，16：3(臺北，2009)，頁87-132。

97 〈文政學部講座の開設年度表〉，附在〈臺灣帝國大學官制制定ノ件〉收入阿部洋等編，《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101卷》(東京：龍溪書舍，2011)，頁71-72。有關南洋史講座相關研究，參閱松田吉郎、陳瑜，〈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南洋史學の成立と展開〉，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國日本と殖民地大學》(東京：まゆに書房，2014)，頁251-284；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臺大歷史學報》，61(臺北，2018)，頁17-95。

是以除東洋和南洋外，臺灣自然也在研究視野之中。⁹⁸

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不久後，適逢昭和五年(1930)的熱蘭遮城(Zeelandia)建城三百年，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編《臺灣文化史說》一書，其中除了收入臺北帝國大學首任校長幣原坦〈國史より見たる三百年記念〉外，也收錄村上直次郎〈ゼーランヂヤ築城史話〉、〈蘭人の蕃社教育〉、〈臺灣蕃語文書〉。翌年再出續編《續臺灣文化史說》，收錄臺灣總督府技師栗山俊一所寫的〈安平城址と赤嵌樓に就て〉，及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所寫的〈臺灣三百年の史料〉、連雅堂〈鄭氏時代の文化〉、尾崎秀真〈清朝時代の臺灣文化〉。以下將對其中與臺北帝國大學相關的幣原坦和村上直次郎的研究做進一步說明。

(一) 臺北帝國大學校長幣原坦的臺灣史研究

闡釋設置「臺北帝國大學」理念之〈說明書〉的作者，是臺北帝國大學首任校長幣原坦。幣原本就將臺北帝國大學定位為有利於日本帝國殖民地統治的研究基地，並以此理念經營，故對臺灣人的教育並不重視。⁹⁹他熱中於臺灣史研究。幣原坦於明治二十六年(1893)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國史學科，並受到當時歷史實證主義學風薰陶。根據他的回憶，當時「極力強調正視事實，東洋兩洋的考證學一時合流於此」。¹⁰⁰他在學時已大量閱讀日本史以外的各國歷史，能從世界史視野進行研究，這也使他後來得以成為具國際視野的教育行政

98 〈說明書〉，附在〈臺灣帝國大學官制制定ノ件〉，收入阿部洋等編，《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101卷》，頁51-67。

99 瀧井一博，〈殖民地帝國のエートス——臺北帝國大學初代總長幣原坦の思想形成〉，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國日本と殖民地大學》，頁62-68。

100 幣原坦，〈言志〉，《臺灣警察時報》，194(臺北，1932)，頁85-86。

官。¹⁰¹他於明治三十一年(1905)赴朝鮮半島擔任韓國學政參與官，明治四十四年(1911)回到日本任文部省視學官，並兼任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學第一講座教授。有意思的是，他在朝鮮半島任職期間開始研究朝鮮史，到臺灣後又從事臺灣史研究。他的著作有《南島沿革史論》(1899)、《韓國政爭志》(1907)、《朝鮮教育論》(1919)、《朝鮮史話》(1924)、《世界の變遷を見る》(1926)、《南方文化の建設へ》(1938)等。¹⁰²

幣原坦主要以朝鮮史研究為人所知，但他很早就開始關注南洋史相關問題。如《南島沿革史論》(明治三十二年[1899]出版)對琉球史問題的討論，¹⁰³《世界の變遷を見る》(大正十五年[1926]出版)主張日本應在東洋學之外發展「南洋學」。¹⁰⁴而他在《臺灣時報》發表的〈臺灣の學術的價值〉(大正十五年[1926]12月)，既從南洋研究的角度強調臺灣的重要性，也簡單論及早期臺灣史的問題，如：日本人可能從室町時代就開始來到臺灣、濱田彌兵衛與荷蘭人的爭執、鄭成功征臺等。¹⁰⁵幣原坦收錄於《臺灣文化史說》中的〈國史より見たる三百年記念〉本是一場演講稿，內容大都可見於〈臺灣の學術的價值〉，但對鄭成功的身世和征臺之役有更詳細的考察；此外，日後《南方文化の建設へ》中關於臺灣研究大半的想法與內容也都可見諸這份演講稿。

《南方文化の建設へ》實際上就是一本臺灣史研究書。該書共有十八章：第一章「高砂國的考察(高砂國の考察)」、第二章「臺灣名稱論」、第三章「瑯嶠族的假設(瑯嶠族の想定)」、第四章「對混同琉球與臺灣論爭之批判(琉球・臺灣混同論爭の批判)」、第五章「竹筐考(かたま考)」、第

101 瀧井一博，〈植民地帝國のエートス〉，頁 48。

102 瀧井一博，〈植民地帝國のエートス〉，頁 49。

103 幣原坦，《南島沿革史論》(東京：富山房，1899)。

104 幣原坦，《世界の變遷を見る》(東京：富山房，1926)，頁 240。

105 幣原坦，〈臺灣の學術的價值〉，《臺灣時報》，85(臺北，1926)，頁 25-34。

第六章「究査濱田彌兵衛事件(濱田彌兵衛事件の究査)」、第七章「西班牙與荷蘭兩國在北臺灣的角逐(北臺灣に於ける西・蘭兩國の角逐)」、第八章「嫁給老一官的田川氏(老一官に嫁した田川氏)」、第九章「國姓爺的臺灣攻略(國姓爺の臺灣攻略)」、第十章「國姓爺的呂宋招諭(國姓爺の呂宋招諭)」、第十一章「卑南大王」、第十二章「宜蘭民族考」、第十三章「日出國(朝日てる國)」、第十四章「黃金與硫黃及煤の探檢(金・硫黃及び石炭の探檢)」、第十五章「琉球藩民虐殺事件和征蕃之役及其影響(琉球藩民虐殺事件と征蕃役及び其の影響)」、第十六章「清領時期臺灣的東西交通路(支那時代臺灣に於ける東西の交通路)」、第十七章「清領時期臺灣教育概觀(支那時代の臺灣教育概觀)」、第十八章「日本領臺後教育的發達(領臺以後の教育の發達)」。

該書與里斯《臺灣島史》的對話最明顯展現在第三章「瑯嶠族的假設」。幣原坦大致肯定里斯關於臺灣南部的「琅璫」族來自琉球的推論，但不贊成移民是先到臺灣西北部後受馬來人種驅逐才轉到臺灣南部，認為他們是一開始就漂流到臺灣南部並定居於此。¹⁰⁶此外他也認同里斯對古代中國將臺灣和日本間一整列群島稱為琉球的假設。¹⁰⁷最後，幣原在關於鄭成功的討論中稱讚里斯《臺灣島史》利用荷蘭史料，使鄭成功研究有所進展。因此後來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1928)也引用里斯之論。¹⁰⁸

但就學術角度來說，里斯的臺灣史論，特別是日荷交流史的相關研究，已由村上直次郎繼承，而村上在史料掌握和局部問題研究方面無疑有更好的發展。幣原坦在 1926 年寫的〈臺灣の學術的價值〉也

106 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1938)，頁 43-44。

107 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頁 64。在討論「卑南大王」時，又再度提及里斯之論(頁 256)。

108 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頁 182。

據村上直次郎《日蘭三百年の親交》所指出的「臺灣島のタユワン即今の安平の地」，說明「タユワン」即「安平之地的土名」。¹⁰⁹因此，南洋史學科成立後村上自然成為該學科講座教授的不二人選。

(二) 南洋史學科教授的臺灣史研究

除首任臺北帝國大學校長幣原坦之外，首任東洋史講座教授藤田豐八(1869-1929)、首任國史講座教授小葉田淳(1905-2001)、南洋史與西洋史首任講座教授村上直次郎等文政學部講座教授，也都是帝國大學成立後的早期學生，¹¹⁰是以臺灣也延續了帝國大學的學問傳統，重視東西交流史、南洋史，也研究臺灣史。隨著日本南進政策和南洋學的發展，日歐交流史也發展出探究過去歐洲殖民地的南洋地域研究分支。所以，臺北帝國大學成為第一個設有南洋史學科的帝國大學。綜觀南洋史學科學生的畢業論文，大抵為南洋史(主要是今日的東南亞史)研究，但也有如中村孝志〈西班牙、荷蘭兩國人在臺灣的教化事業(臺灣に於ける西、蘭両国人の教化事業)〉這種以臺灣史為題的論文，¹¹¹可知當時南洋史學科的學生也從事具南洋史視野的臺灣史研究。

以下，以南洋史前後任講座教授村上直次郎和岩生成一的臺灣史研究為例說明。村上直次郎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受文部省之命到西班牙、義大利、荷蘭留學，並於1902年回國後擔任東大史料編纂員，兼職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其後也擔任東京外國語學校校長等工

¹⁰⁹ 幣原坦，〈臺灣の學術的價值〉，頁28。

¹¹⁰ 松田吉郎、陳瑜，〈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南洋史學の成立と展開〉，頁260-261。

¹¹¹ 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頁43-45。

作。1928年，村上來臺擔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直到1935年才返回日本。¹¹²在臺期間，他寫出〈熱蘭遮城的築城史話(ゼーランヂャ築城史話)〉、〈蘭人の蕃社教化〉、〈臺灣蕃語文書〉(《臺灣文化史說》，1930)、〈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に就いて〉(1930)、〈Sinkan Manuscripts〉(1933)、〈鄭氏以前の臺灣〉(1935)等與臺灣史相關的論文。¹¹³

村上於〈ゼーランヂャ築城史話〉中再深化《日蘭三百年の親交訂正再版》的論述，利用海牙市國立文書館所藏「從一六二四年到一六二五年顯示大員地勢的海圖(タイオワンの地勢を示したる一六二四年到一六二五年の海図)」與當時在臺荷蘭長官所寫報告書等荷蘭文史料和《臺灣縣誌》等漢文史料，論述荷蘭為與葡萄牙、西班牙對抗，在1620年代先落腳澎湖，與明朝政府交涉後再到「タイオワン」(大員·今之安平)的過程。¹¹⁴在〈蘭人の蕃社教化〉中，村上利用《異國日記》和烏特勒支(ユトレヒト)出版的《オランダ布教史料》等日文和荷蘭文史料，論述荷蘭人對新港社人等原住民的懷柔與教育、在臺灣傳教的過程，及其與日本的交涉和衝突。¹¹⁵在〈臺灣蕃語文書〉中，村上利用《臺灣府誌》等史料，對「新港文書」進行討論，說明它在清朝統治時期的使用，並分析新港語彙。¹¹⁶此外，〈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に就いて〉一文則是發表在《臺灣時報》上的短文，內容包括上述臺灣早期

112 東方學會編，〈村上直次郎博士略歷〉，頁158-159。

113 村上直次郎尚有其他臺灣史論，因篇幅關係，無法全部論及。葉碧苓有所論述，參見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頁24-28。

114 村上直次郎，〈ゼーランヂャ築城史話〉，收入幣原坦等，《臺灣文化史說》(臺北：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1930)，頁33-89。

115 村上直次郎，〈蘭人の蕃社教化〉，收入幣原坦等，《臺灣文化史說》，頁92-118。

116 村上直次郎，〈臺灣蕃語文書〉，收入幣原坦等，《臺灣文化史說》，頁119-160。

歷史。¹¹⁷

其他如〈Sinkan Manuscripts〉是介紹、探究「新港文書」的文章，¹¹⁸〈鄭氏以前の臺灣〉則以臺灣早期歷史為討論對象。值得注意的是，村上在〈鄭氏以前の臺灣〉中，據平戶英國商館コックス(Richard Cocks, 1566-1624)的日記，描述村山等安(?-1619)獲得幕府許可派遣艦隊征伐臺灣，途中遭遇暴風，僅一艘船成功抵達臺灣，卻又因土人突擊而喪生。同時他也據平戶荷蘭商館第一任總督スペックス(Jacques Specx, 1585-1652)於寬永六年(1629)送交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報告書，指出村山等安的艦隊實際上占領過臺灣，但因缺乏後援而放棄。¹¹⁹村上並未針對兩份史料的出入做進一步分析。事實上，在此之前岩生成一對村山等安遠征臺灣已有相關研究，村上雖未引用，但應有參閱。不論如何，我們可看出，在村上擔任南洋史學科講座教授期間，他較里斯與其他臺灣史研究者更進一步使用荷蘭、日本和中國的第一手史料，分析臺灣在被鄭氏占領前與日本、荷蘭相關的早期歷史。這也是更進一步從南洋史乃至世界史視野中展開「新史學」的臺灣史研究。

此外，1887年起荷蘭史家便開始注釋《巴達維亞城日記》並付梓出版，村上將其中與臺灣有關的部分摘譯為日文，收在《臺灣史料雜纂》第三卷，並在返日後於1941-1942年間整理出版為《抄譯バタビヤ城日記》上、中冊；下冊則由中村孝志整理後，於1975年與上、中冊再增補校注一起出版。¹²⁰由上述的研究題目可知，村上在南洋史學

117 村上直次郎，〈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に就いて〉，收入《臺灣時報》，132(臺北，1930)，頁6-9。

118 村上直次郎，〈Sinkan Manuscripts〉，《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2：1(臺北，1933)，頁1-228。

119 村上直次郎，〈鄭氏以前の臺灣〉，《東洋》，38：9(臺北，1935)，頁46-57。

120 中村孝志，〈跋文〉，收入東印度公司著，劉寧顏主編，村上直次郎日譯，

科任職前後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從日歐交流史角度探究臺灣史相關問題，且更偏向臺灣與荷蘭關係史。雖然他也關注日本與早期臺灣的歷史，但研究相對較少，並未仔細展開論述。這一方面的問題主要是由同樣擔任南洋史講座助教授的岩生成一所開展的。

岩生成一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國史學科，後入東京帝大史料編纂掛，並於昭和四年(1929)開始擔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講授南洋史。昭和十一年(1936)，升任教授。昭和十六年(1941)，以《南洋日本町之研究》獲帝國學士院賞。以下簡述其臺灣史研究相關著作。昭和九年(1934)發表的〈長崎代官村山等安の臺灣遠征と遣明使〉，使用了日本、歐洲、中國三方的史料，分析村山等安與基督教的關聯、其派遣人員遠征臺灣和遣使赴明的動機，及其一家悲慘的命運。¹²¹岩生成一指出，村山等安遠征臺灣的主要動機是要以臺灣為日本與中國貿易的中介地。並從日本「向南發展」之勢來理解豐臣秀吉派遣使節前往臺灣、德川家康派遣有馬晴信前往臺灣視察，及村山等安遠征臺灣等事件的歷史意義。¹²²該文發表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輯，對於在南進政策思惟中定位南洋史學極具象徵意義。其後，他在昭和十一年(1936)於《東洋學報》第二十三卷第三號發表〈明末日本僑寓支那甲必丹李旦考〉，¹²³又於昭和十四年(1939)寫出〈有馬晴信の臺灣島視察船派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阪上福一編輯，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

中村孝志校注，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頁 418-425。

¹²¹ 岩生成一，〈長崎代官村山等安の臺灣遠征と遣明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1(臺北，1934)，頁 285-359。

¹²² 岩生成一，〈長崎代官村山等安の臺灣遠征と遣明使〉，頁 336、337。

¹²³ 之後，岩生於 1985 年再發表〈明末日本僑寓シナ貿易商一官アウグスチン李國助の活動——「明末日本僑寓支那甲必丹李旦考」補考〉，《東洋學報》，66：1-4(東京，1985)，頁 63-86。

館編)。在後文中，岩生在辻善之助〈江戸時代に於ける臺灣及菲律賓遠征の企圖〉的研究基礎上，利用中國、日本和歐州的第一手史料，指出該事件與薩摩入侵琉球約莫同時，故主張有馬晴信受家康之命派遣部下到臺灣的任務雖未成功，但也刺激當時東亞局勢，帶給明朝士人和葡萄牙人極大的衝擊。另外，昭和十七年(1942)，岩生在過去發表的〈豊臣秀吉の臺灣征伐計畫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三十八卷第八號)基礎上，利用歐洲與中國、日本的史料，再發表〈豊臣秀吉の臺灣島招諭計畫〉(《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七輯)，從當時的整體國際情勢理解豊臣秀吉征服世界的野望，主張豊臣秀吉對臺灣的招諭計劃刺激明朝加強在澎湖的守備，並促使後來在呂宋島的西班牙人計畫占領臺灣。由上所述可知，岩生成一主要從日本對外關係史乃至日臺關係史的角度，研究戰國至江戸時代初期與臺灣相關的日本人物事蹟。岩生在二戰後的名著《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的第七章〈臺灣における日本人〉就是在上述論文基礎上展開的，至今依然是了解早期日本人在臺活動的重要參考書。日本殖民臺灣初期，政治家和知識人在言及相關問題時僅以政治目的強調曾經統治臺灣的事實；¹²⁴然而，岩生成一卻利用近代歷史學重視史料蒐集與分析的方法，依據日文、漢文乃至歐文史料，進行真正近代學術意義的論述，並與村上直次郎等人一起推進臺灣史的「新史學」。必須強調的是，上述岩生成一的研究雖屬日臺關係史研究，然其研究不僅限於南洋史範疇，也同時關注當時的國際關係，具有世界史視野。¹²⁵只是他們從里斯歐洲中心的世界史轉向更偏向日本中心、海洋中心的世界史，從而引導了二戰後的海洋史研究。

124 如內藤耶叟在日本領有臺灣後，在 1896 年就發表了〈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的講演，該講演內容收錄在《皇典講究所講演》，168(東京，1896)。相關問題，筆者擬再另撰文探究。

125 關於這一論點，感謝兩位審查人的提點。

六、結語

關於日本近代日本史「新史學」的展開，大抵皆由里斯赴日教學談起，並主要著眼於其所帶來的新歷史觀念和研究方法。如上所述，日本臺灣史研究的「新史學」也當以里斯為起點，而其《臺灣島史》也是臺灣史研究「新史學」的開端。不過這一意義的「新史學」不同於近代日本史或中國史意義的「新史學」，並非由臺灣人民打造屬於臺灣民族的民族國家歷史，而是在列強競逐的世界史架構中解釋臺灣島上的統治民族變遷，並在此一脈絡中肯定日本統治臺灣的意義。此外，由於受到蘭克史學的影響，里斯的世界史視野也不免以歐洲為中心，且以政治史為主。

里斯之後，帝國大學第一、二世代的史學者，不論是西洋史(日歐交流史)、日本史(「國史」、日本對外關係史)、東洋史(中日交流史)，都從與其研究領域相關的交流史視角出發，研究與臺灣史相關的問題。對此一時期的日本而言，臺灣不是境外的國家、民族，而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臺灣史既可從世界史視角來討論，也涵蓋在日本帝國的歷史中。

又，如上所述，里斯雖開啓了日本的臺灣史研究，然因他對日文和漢文史料的理解有限，其研究本身的學術價值或不高(特別是鄭成功統治臺灣以後的論述)。但也正因他引導學生進入日歐、歐亞交流史研究，進而使村上直次郎等人投入臺灣史相關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臺北帝國大學的臺灣史研究中，只有幣原坦較常引用里斯之論，其他如岩生成一等南洋史學科教授幾乎不再引用里斯，而是引用村上直次郎的著作。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與南進，臺灣被打造成「南方文明之研究中心」，臺北帝國大學也以南洋學(包括南洋史學)為發展重點。而本就在日歐交流史視野中關注歐洲殖民地之南洋史問題的村上直次郎，遂成為南洋史學科的

講座教授，從事南洋史及相關臺荷交流史研究。其弟子岩生成一則繼承他日歐(特別是日荷)交流史方面的研究，更進一步展開南洋史學研究，並探討臺日關係史。我們可說，里斯的臺灣史研究雖被更精密的南洋史視野下的臺灣史研究取代，但背後的世界史視野並未消退，只是在南進政策思惟下，發展為更日本中心、海洋中心的世界史論。

最後，隨著受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教育的張美惠(長谷川ミエ，1924-2008)和陳荊和(1917-1995)等臺籍學者離開臺灣，這一南洋史、海洋史視野下的臺灣史研究在二戰後的臺灣一度中斷。¹²⁶不過，由於岩生成一在臺灣的閉門弟子曹永和(1920-2014)的努力，南洋史乃至海洋史視野的臺灣史研究得以在臺灣生根、發芽、茁壯。¹²⁷當然，在曹永和的論文中已難以見到里斯之論，但有意思的是，曹永和在 1990 年使用了和里斯相同的「臺灣島史」這個說法——不過背後的意義和方法論已然不同。¹²⁸曹永和是在南洋史學的基礎上，受重視空間區域、人民、長時段歷史等要素的年鑑學派啟發，¹²⁹主張以「臺灣島」為一空間單位，以島上人民為研究主體，在長時段的時間中來研究臺灣歷史。但不管是里斯還是曹永和的「臺灣島史」論，都將繼續引領我們在全球

126 周婉窋，〈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頁 59-72。

127 曹永和並非在殖民地時期直接受教於岩生成一，而是在 1962 年時才第一次見面，並在參加東洋文庫的研究計畫後，才在日本接受岩生成一的指導。參閱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 108-113。

128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途徑——「臺灣島史」〉，收入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頁 445-449。該文於 1990 年首刊於《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129 曹永和在〈臺灣史的研究〉(收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一文直接言及法國年鑑學派與其臺灣史觀的關係(頁 456)。另在《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也有提及(頁 160-161)。

史視野中探究海洋的歷史，以及海洋與「臺灣島」的歷史。

(本文於 2020 年 10 月 21 日收稿；2021 年 5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及看過此文初稿的張谷銘教授和陳致宏教授給予寶貴意見，使本人獲益良多。又，感謝陳乃蓓和胡頌幫助校閱本文。本文是科技部計畫(106-2628-H-001-002-MY3)成果之一。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內田銀藏，《國史總論及日本近世史》，東京：同文館，1921。

內藤恥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皇典講究所講演》，168(東京，1896)，頁 21-27。

市村瓚次郎，《支那史研究》，東京：春秋社松柏館，1943。

市村瓚次郎，〈清初臺灣の鄭氏に關する文書〉，《史學雜誌》，13：9、10、12(東京，1902)，頁 980-993、1082-1094、1269-1277。

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内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

白鳥庫吉，〈隋書の流求國の言語に就いて〉，《民族學研究》，1：4(東京，1935)。

伯倫漢(Ernst Bernheim)著，陳韜譯，《漢譯世界名著——史學方法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阿部洋編，〈文政學部講座の開設年度表〉，附在〈臺灣帝國大學官制制定ノ件〉，收入阿部洋等編，《日本植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101 卷》，東京：龍溪書舍，2011，頁 71-72。

里斯(Ludwig Riess)著，吉國藤吉譯，《臺灣島史》，東京：富山房，1898。

里斯(Ludwig Riess)著，坂口昂、安藤俊雄譯，《世界史の使命》，東京：岩波書店，1922。

里斯(Ludwig Riess)，〈空前の大史家〉，收入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村川堅固譯，《世界史論進講錄——附・近世列強史論・政治學說史論》，東京：平凡社，1932，頁 1-4。

- 里斯(Ludwig Riess)著，原潔、永岡敦譯，《ドイツ歴史學者の天皇國家觀》，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8。
- 里斯(Ludwig Riess)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 村上直次郎，〈臺灣新港社文書〉，《史學雜誌》，8：7(東京，1897)。
- 村上直次郎，《西洋商業史(明治大學三十八年度商學科第一學年講義錄)》，東京：明治大學出版部，1905。
- 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の平戸》，東京：日本學術普及會，1917。
- 村上直次郎，《日蘭三百年の親交》，東京：富山房，1915。
- 村上直次郎校注，《增訂異國日記抄》，收入《異國叢書第11》，東京：駿南社，1929。
- 村上直次郎，〈ゼーランヂヤ築城史話〉，收入幣原坦等，《臺灣文化史說》，臺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0，頁33-89。
- 村上直次郎，〈蘭人の蕃社教化〉，收入幣原坦等，《臺灣文化史說》，臺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0，頁92-118。
- 村上直次郎，〈臺灣蕃語文書〉，收入幣原坦等，《臺灣文化史說》，臺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0，頁119-160。
- 村上直次郎，〈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に就いて〉，收入《臺灣時報》，132(臺北，1930)，頁6-9。
- 村上直次郎，〈Sinkan Manuscripts〉，《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2：1(臺北，1933)，頁1-228。
- 村上直次郎，〈鄭氏以前の臺灣〉，《東洋》，38：9(臺北，1935)，頁46-57。
- 岩生成一，〈豊臣秀吉の臺灣征伐計畫について〉，《史學雜誌》，38：8(東京，1927)，頁750-763。
- 岩生成一，〈長崎代官村山等安の臺灣遠征と遣明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1(臺北，1934)，頁285-359。
- 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支那甲必丹李旦考〉，《東洋學報》，23：3(東京，1936)。

- 岩生成一，〈有馬晴信の臺灣島視察船派遣〉，收入阪上福一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1939。
- 岩生成一，〈豐臣秀吉の臺灣島招諭計畫〉，《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7(臺北，1942)，頁 75-118。
- 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シナ貿易商一官アウグスチン李國助の活動——「明末日本僑寓支那甲必丹李旦考」補考〉，《東洋學報》，66：1-4(東京，1985)，頁 63-86。
- 岩生成一，〈臺灣における日本人〉，收入岩生成一，《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頁 281-302。
-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ついて〉，《東洋學報》，14：4(東京，1924)。
- 和田清，〈再び隋書の流求國に就いて〉，《歷史地理》，57：3(東京，1931)。
- 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東京：京文社，1930。
- 秋山謙蔵，〈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歷史地理》，54：2(東京，1929)。
- 秋山謙蔵，〈流求即臺灣說成立の過程——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關する第二論〉，《歷史地理》，58：6(東京，1931)。
- 秋山謙蔵，〈流求即臺灣說再批判——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關する第三論〉，《歷史地理》，59：1(東京，1932)。
- 梁啓超，《新史學》，收入梁啓超，《飲冰室合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幣原坦，《世界の變遷を見る》，東京：富山房，1926。
- 幣原坦，〈臺灣の學術的價值〉，《臺灣時報》，85(臺北，1926)，頁 25-34。
- 幣原坦，〈言志〉，《臺灣警察時報》，194(臺北：1932)，頁 85-86。
- 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1938。
- 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村川堅固譯，《世界史論進講錄——附・近世列強史論・政治學說史論》，東京：平凡社，1932。
- 蘭克(Leopold von Ranke)，村岡哲譯，《列強論》，收入林健太郎編，《世界の名著——ランケ》，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頁 45-83。

Riess, Ludwig. *Methodology of History*, 東京大學総合図書館蔵本。

Weber, Georg.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3. Aufl., vollständig neu bearbeitet von Ludwig Riess. Leipzig. 1919 (Bd.I.), 1920 (Bd.II.).

二、近人論著

ヘーゼル・ジョーンズ(Hazel J. Jones)著，宮川幸江譯，〈グリフィスのテーゼと明治のお雇い外国人政策〉，收入アーダス・パークス編，梅溪昇譯，《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留學生・お雇い外国人と明治》，京都：思文閣，1990，頁 211-240。

アーダス・パークス(Ardath W. Burks)著，長谷川精一譯，〈日本から外へ——海外留學生——〉，收入アーダス・パークス編，梅溪昇譯，《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留學生・お雇い外国人と明治》，京都：思文閣，1990，頁 129-144。

アーダス・パークス(Ardath W. Burks)，〈西洋から日本へ——お雇い外国人——〉，收入アーダス・パークス編，梅溪昇譯，《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留學生・お雇い外国人と明治》，京都：思文閣，1990，頁 179-199。

マーガレット・メール(Margaret Mehl)著，近藤成一譯，〈明治史學におけるドイツの影響——どれ程意義ある影響だったのか〉，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歴史學と史料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頁 182-201。

マーガレット・メール(Margaret Mehl)著，千葉真、松澤裕作等譯，《歴史と國家——19世紀日本の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學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7。

ロバート・S・シュワンテス(Robert S. Schwantes)，〈日本の發展におけるお雇い外国人〉，收入アーダス・パークス編，梅溪昇譯，《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留學生・お雇い外国人と明治》，京都：思文閣，1990，頁 200-210。

土肥恒之，《西洋史學の先驅者たち》，東京：中公叢書，2012。

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第7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 大原俊一郎，〈ドイツ國際政治史學の歴史的文脈と思想——反霸權から秩序形成へ〉，
《亞細亞法學》，59：2(東京，2016)，頁 159-188。
- 小澤榮一，〈近代日本史學史の研究 明治編——十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學の研究〉，東
京：吉川弘文館，1968。
- 山里純一，〈『隋書』流求傳について——研究史・學說の整理を中心に〉，《琉球大
學法文學部紀要・史學・地理學篇》，36(西原，1993)，頁 59-98。
- 今井登志喜，〈西洋史學の本邦史學に與へたる影響〉，收入史學會編，《本邦史學史
論叢下卷》，東京：富山房，1939，頁 1439-1469。
-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3。
- 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學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收入神田信夫先生古
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
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97-126。
- 中村孝志，〈跋文〉，收入東印度公司著，劉寧顏主編，村上直次郎日譯，中村孝志校
注，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
頁 418-425。
-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
學」〉，《臺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3)，頁 191-236。
-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2。
- 方豪，〈日人著作中臺灣漢文文獻糾謬述例〉，收入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 石附實，〈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學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72。
- 西川洋一，〈東京とベルリンにおける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
纂所編，《歷史學と史料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頁 202-233。
-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13：3(臺北，

2002), 頁 21-42。

尾形裕康,《西洋教育移入の方途》,東京:野間教育研究所,1961。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收入關玲玲、楊宗霖編校,《李東華教授論文集》,新北:稻香出版社,2013,頁 233-253。原論文出處:《中國論壇》,241(臺北,1985),頁 36-43。

李東華,〈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1928-1960)〉,收入李金強編,《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147-171。該文後再收入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67-195。

李恒全,〈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史に關する一考察〉,《神戸大學發達科學部研究紀要》,14:1(神戸,2006),頁 45-54。

吳密察,〈殖民地大學とその戰後〉,收入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食野充宏譯,《記憶する臺灣——帝國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臺灣史學史素描(一)〉,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1-21。

吳密察,〈臺灣史の成立とその課題〉,收入溝口雄三主編,《周縁からの歴史 アジアから考える[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佐藤真一,《ヨーロッパ史學史——探究の軌跡》,東京:知泉書館,2016。

東方學會編,〈村上直次郎博士略歷〉,收入財團法人東方學會編,《東方學回想》,第1冊,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 135-164。

河西晃祐,〈南洋協會と大正期「南進」の展開〉,《紀尾井史學》,18(東京,1998),頁 39-53。

松田吉郎、陳瑜,〈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南洋史學の成立と展開〉,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彥編,《帝國日本と殖民地大學》,東京:まゆに書房,2014,頁 251-284。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一》,東京:東京大學出

版會，1986。

林健太郎，〈ランケの人と學問〉，收入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林健太郎編，《世界の名著——ランケ》，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頁 1-41。

金井圓，《お雇い外國人 17——人文科學》，東京：鹿島出版會，1976。

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臺大歷史學報》，61(臺北，2018)，頁 17-95。

胡昌智，〈譯介朵伊森書評〈提升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臺大歷史學報》，51(臺北，2013)，頁 181-221。

胡昌智、李孝遷，〈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中華文史論叢》，131(上海，2018)，頁 279-405。

若林正丈，〈「臺灣島史」論から「諸帝國の斷片」論へ——市民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臺灣史觀一瞥〉，《思想》，1119(東京，2017)，頁 85-96。

姚從吾，《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一卷——歷史方法論》，臺北：正中書局，1981。

姚紹基，〈導讀〉，收入里斯(Ludwig Riess)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頁 1-18。

洪健策，《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20。

酒井三郎，《日本西洋史學發達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宮地正人，〈史料編纂所の歴史とその課題〉，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歷史學と史料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頁 163-171。

島尻勝太郎，〈『隋書』流求國傳論争〉，收入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繩大百科事典中卷》，那霸：沖繩タイムス社，1983，頁 513-514。

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Georg G.Iggers)著，彭剛、顧杭譯，《德國的歷史觀》，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陳致宏，《德家史家朵伊森(J.G.Droysen)的歷史思想與現實意識——以《希臘化時代史》為研究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2。

曹永和，〈臺灣史的研究〉，收入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

版公司，2000，頁 451-458。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途徑——「臺灣島史」〉，收入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頁 445-449。

張谷銘，〈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臺北，2016)，頁 375-460。

梅溪昇，《お雇い外國人の研究》，東京：青史出版社，2010。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臺北，2009)，頁 161-184。

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臺北，2003)，頁 181-213。

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 6(香港，1997)，頁 263-285。

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17(臺北，2008)，頁 1-35。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臺灣史研究》，16：3(臺北，2009)，頁 87-132。

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戴麗娟，〈導讀〉，收於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頁 xi-xxiv。

瀧井一博，〈殖民地帝國のエートス——臺北帝國大學初代總長幣原坦の思想形成〉，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彥編，《帝國日本と殖民地大學》，東京：まゆに書房，2014，頁 45-74。

Brownlee, John S.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1945: The Age of the*

Gods and Emperor Jinmu. Vancouver: UBC Press, 1997.

Mommsen, Wolfgang J. "Ranke and the Neo-Rankean School in Imperial Germany: State-oriented Historiography as a Stabilizing Force." In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edited by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124-140.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chleier, Hans. "Ranke in the Manuals on Historical Methods of Droysen, Lorenz, and Bernheim." In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edited by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111-123.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s "New History" in Modern Japan and Studies of Taiwan History

Hung-yueh L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history" approach in studies of Taiwan history that flourished alongsid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modern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First, I argue that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 (History of the Island Formosa)* by Ludwig Ries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w history" approach in studies of Taiwan history. This is mainly because Riess applied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were developed by Leopold von Ranke, Ernst Bernheim, and so forth, to complete his *History of the Island Formosa*. Secon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hese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of historiography were first introduced to Japanese scholars and developed in the imperial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Riess's research into Taiwan history.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further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Riess's disciples, including Tsuji Zennosuke and Murakami Naojirō, both of whom were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Japanese historians growing up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began their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Japan, and initiated thei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Then I proceed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by Taira Shidehara and Murakami Naojirō's disciple, Iwao Seiichi, at Taibei Imperial University. Lastly, I argue that although Riess's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has been replaced by more sophisticated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nyo-shi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Seas), the vision of world history behind it has not faded.

Keywords: Taiwan history, new history, imperial university, Taibei Imperial University, Ludwig Riess